

学术年谱

阎连科文学年谱

梁 鸿 蒋书丽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阎连科出生于河南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田湖村。

这一出生年月并不完全确定，因为家里贫穷，从小一家人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谁都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①母亲对于时间的记忆只与农事相关，肯定是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因为一九五八年特别丰收，家家粮食吃不完，至于是哪一天，就记不得了，只记得生我时天气特别热”。^②

耙耧山脉从远处延伸而来，和陆浑岭形成两条平行线，中间是宽阔的、深深的谷沟，田湖村的居民就散落在这谷沟里和一个个小山包上。阎连科在这里度过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目睹、经历了中国农村、农民的悲喜人生，那个村庄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③

在离田湖镇不远的地方，是东方理学大师程颐、程颢的故里，至今仍有一座纪念他们的寺庙。这座寺庙在阎连科的少年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的印记，只知道“程寺”在“文革”时期被人打砸。直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

脉”之间时，“程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才一点点清晰起来。《两程故里》、《瑶沟系列》、《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黄金洞》、《耙耧天歌》等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化逻辑与象征都与这“寺庙”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九六〇年，三岁。“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阎连科一家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和贫穷中，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④还有就是对身体疼痛的感知，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⑤这给阎连科的心灵和情感带来强烈的震撼。

一九六五年，八岁。入田湖小学。这一入学

①③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4、18、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⑤ 阎连科：《没有边界的跨越 阎连科散文》，第5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时间也是大致的推算,父母亲对此并没有准确的记忆,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

一九六九年,十二岁。农村教育停滞,以背诵毛主席语录为升学标准,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两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演习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

一九七二年,十五岁。就读田湖初中。开始阅读小说,最初的文学营养是“十七年”革命小说,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麦秸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

一九七三年,十六岁。“上山下乡”运动中,田湖村也派有知青。每当家里被“派饭”时,母亲都会拿来舍不得吃的白面、鸡蛋去招待知青。正处于成长时期的阎连科记得那份渴望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解。而让阎连科记忆最深刻的是两起枪毙事件。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那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

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这是关于知青和知青时代的另外一种叙事,和阿城、王安忆、韩少功等人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和观察视角完全不同。

一九七五年,十八岁。就读嵩县四中。入学高中的艰难和痛苦抉择让阎连科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命运的不公。当时的高中录取政策是城镇户口,必须百分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最后,阎连科上了高中,而学习比他好的二姐留在家里成为了农民,就是因为“我是男孩”。正如阎连科所讲,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却的社会歉疚”。

读到当代作家张抗抗的小说《分水岭》萌发了写作的念头,其中也夹杂着由此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开始偷偷写作长篇小说《山乡血火》。

一九七六年,十九岁。因家里生活困难,阎连科辍学,到河南新乡的一个水泥厂打工,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然而这并没有打消阎连科的写作梦想。他又开始动笔写他的长篇小说,这才发现,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手指,已经完全弯曲变形,如同树枝一样干枯弯曲,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他说,这时的写作已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在绝望中,让人觉出有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9、13、16、31页,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2、3页。

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一九七七年,二十岁。每天在水泥厂拉板车,运矿石。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两年,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完成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乡血火》,都是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内容。后来,这部小说的命运是“母亲把它当烧饭、烤火的火引子给烧了”。

哥哥捎信让他回家参加高考,从山上下来,到大街上一看,到处都是贴着“打倒王、张、江、姚”的标语。回到家里以后,课本没找齐,复习了一个星期,就去参加考试”。高考落榜。

一九七八年,二十一岁。重新参加高考。再次落榜。年底应征入伍。第一次见到火车,到部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第一次知道小说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的,还有刊物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一九七九年,二十二岁。参加了所在军区办的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完成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良心》,未曾发表,之后又创作短篇《天麻的故事》,发表在军区《战斗报》副刊上,这是阎连科的处女作。

这一年的二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家人因担心阎连科去前线打仗而“四处烧香、求佛”,阎连科深切体会到了战争对个人、家庭的破坏。“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不期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就是战争留给我的最初的、永不可抹去的一幅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了。大姐、二姐含着眼泪走出来了。左右邻居匆匆地到家里来了。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回归所带来的激动。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出来的。他走得很慢,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也就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的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

一九八〇年,二十三岁。发表了第二篇小说《热风》(《战斗文艺》第三期),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人生目标对他变得逐渐清晰起来。随后的

日子里阎连科勤奋于小说创作和新闻报道的采写,并荣立了三等功。后来谈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初衷,阎连科诚恳地说道:“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为了到城里去,有一个‘铁饭碗’端在手里……事实上,我也的确是通过写作最终达到了逃离土地的目的。当兵、入党、立功、提干,那一段艰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过发了那么几篇所谓的小说、独幕话剧和几首顺口溜一样的诗歌走完的”。

一九八一年,二十四岁。复员返乡。因其创作的独幕话剧《挂匾》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而被部队再次招回。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菜庵子里三个兵》(《战斗文艺》第三期)。

一九八二年,二十五岁。在部队提干,成为师政治部文化干事。发表短篇小说《烧鸡大王》(《艺丛》第六期)。

一九八三年,二十六岁。考入河南大学政教系。发表《领补助金的女人》(《百花园》第三期)。

一九八四年,二十七岁。发表四篇短篇小说,分别是《士兵 士兵》(《战斗文艺》第二期)、《待嫁女》(《东京文学》第二期)、《将军》(《奔流》第二期)、《妻子们来度假》(《东京文学》第十期)。这些作品大多与其军旅生活相关。

农历十一月十三,父亲去世。阎连科在父亲的劳作中完成了对苦难、坚韧和土地的基本认知,那料礅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锄柄才站了起来……“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浸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此后,阎连科不断修改散文《想念父亲》,以表达

阎连科:《我与父辈》第35、29页。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2、13页。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4页。

《阎连科文集·感谢祈祷》第31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阎连科:《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第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阎连科:《想念父亲》,《没有边界的跨越:阎连科散文》第12页。

2009年出版的《我与父辈》,2012年出版的《一个人的三条河》都收录了《想念父亲》,都有文字上的改动。

对父亲的思念和愧疚。

一九八五年,二十八岁。发表《归》(《百花园》第二期)。

一九八六年,二十九岁。发表短篇小说《村路弯弯》(《东京文学》第一期)和第一部中篇小说《小村小河》(《昆仑》第五期)。这一时期作品显示了阎连科在写作风格和技巧上的探索,《小村小河》用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镜头切换架设结构。

一九八七年,三十岁。发表《英雄今夜上前线》(《边防文学》第一期)。

一九八八年,三十一岁。发表成名作中篇小说《两程故里》(《昆仑》第一期)。由《昆仑》编辑部和《小说选刊》编辑部联合召开“阎连科作品研讨会”。《两程故里》显示出作者对当代乡村生活内部逻辑的熟悉和洞察力,也初次展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两程故里》获该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阎连科本人获该年度“昆仑青年作家奖”。同年发表《纹地》(《解放军文艺》第一期)和《雪天里》(《解放军文艺》第十二期)。

一九八九年,三十二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先后有六篇小说问世。中篇有《横活》(《昆仑》第二期)、《祠堂》(《解放军文艺》第三期)和《寨子沟 乱石盘》(《莽原》第三期)短篇小说有《爷呀》(《萌芽》第二期)、《最后的辉煌》(《青年文学》第五期)和《大哥经过一场暴风雨》(《解放军文艺》第十期)。其中《祠堂》再次获得该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一九九〇年,三十三岁。创作“瑶沟系列”小说。在文学界和批评界开始获得关注。这一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有:《斗鸡》(《昆仑》第一期)、《乡难》(《解放军文艺》第二期)、《瑶沟人的梦》(《十月》第四期)、《瑶沟的日头》(《中国作家》第四期)、《悲哀》(《时代文学》第四期)、《故乡的叹息》(《莽原》第四期)短篇小说有:《四叔的身份》(《萌芽》第二期)和《走出蓝村》(《福建文学》第九期)。

《瑶沟人的梦》先后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分别获得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中篇奖、第四届《十月》文学奖和“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度《中篇小说选刊》文学奖”。这批小说以其朴素混沌的乡土色彩和“自我”介入的叙述方式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一九九一年,三十四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不能直立、行走和端坐,但其写作却更加勤奋、喷薄,即便在不能坐时要趴在床上写作,还在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均有大的收获。中篇有:《婚幻》(《当代》第一期)、《乡间故事》(《收获》第一期)、《中士还乡》(《时代文学》第二期)、《晶莹十二岁》(《黄河》第四期)、《往返在塬梁》(《时代文学》第五期)、《黑乌鸦》(《收获》第五期)、《玉娇 玉娇》(《小说家》第五期)和《家诗》(《人民文学》第六期)。短篇小说有:《石龟》(《前卫文学》第一期)、《最后一场冬雪》(《青年文学》第六期)和《在冬日》(《清明》第六期)。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感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写他所熟悉的农村题材,并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主人公的经历和作者有极大的相似度,甚至名字就是“连科”。

一九九二年,三十五岁。完成多部“和平军人系列”作品。《从军行》(《莽原》第三期)、《和平雪》(《花城》第四期)、《寻找土地》(《收获》第四期)、《夏日落》(《黄河》第六期)和《老屋》(《青年文学》第十期)。仅有的一部短篇是《饭场》(《翠苑》第五期)。

《夏日落》迅速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获得“《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在问及受关注的原因时,阎连科认为“可能把‘军人’降到了‘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位置上,对作为军人的人给予了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其中,它对英雄主义的解构,对理想主义的反叛,在这部小说里都体现得非常明确”。在随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阎连科遭到批评,《夏日落》被禁。

一九九三年,三十六岁。阎连科因长期趴在床上写作,而开始患上颈椎骨质增生,但仍然以每年六部小说的速度进行创作,其中五部中篇为《和平寓言》(《收获》第二期)、《自由落体祭》(《作家》第三期)、《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百花洲》第四期)、《艺妓芙蓉》(《昆仑》第五

期)和《鸟孩诞生》(《黄河》第六期)。一部短篇是《从军行》(《作家》第一期)。

这批小说的人物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军人”,阎连科以这两种身份的交错为核心,对现代军人的复杂存在进行探索,被评论家称为“农民之子”,并引发了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灵魂问题的探讨。

《寻找土地》、《自由落体祭》、《鸟孩诞生》都显示了阎连科在小说结构和意识上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它们是作家对乡土中国内部逻辑的理解和精神样态的独特表达。

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百花文艺出版社),后来分别由时代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三)和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七)再版。小说采用的是人界和鬼界交替的结构模式,也是农村和城市场景的交替变换。作家大胆、荒诞而又充满寓言性的想象力开始展露其力量。

也是在完成这部小说后,阎连科的身体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腰椎病和颈椎增生导致的头晕使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开始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一九九四年,三十七岁。发表中篇小说《欢乐家园》(《莽原》第二期)、《天宫图》(《收获》第四期)、《和平战》(《中国作家》第四期)、《战争造访和平》(《花城》第四期)、《行色匆忙》(《小说家》第五期)和《耙耧山脉》(《萌芽》第六期)。《耙耧山脉》获得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上海优秀中篇小说大奖。该作也开启了阎连科的又一个创作系列,即“耙耧系列”。它和之前的“瑶沟系列”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开启了阎连科苦难史诗的序幕。在“陌生化”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的同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残酷真实。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艺术风格,在其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这一年,阎连科被调往北京二炮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举家从河南迁往北京。

一九九五年,三十八岁。这一年可以看作是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年:《在和平的日子里》(《钟山》第一期)、《和平殇》(《花城》第一期)、《辉煌

狱门》(《红岩》第三期)、《乡村死亡报告》(《青年文学》第三期)、《寓意罪孽》(《黄河》第三期)、《四号禁区》(《昆仑》第四期)、《朝着天堂走》(《十月》第四期)和《都市之光》(《当代作家》第六期)。短篇小说是《生死老小》(《北方文学》第六期)和《乡村士兵与过程》(《春风》第十七期)。该年度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死亡报告》,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蕴,也继续了其“残酷”风格。刊发该作的《青年文学》随后发表了“评论辑”。

一九九六年,三十九岁。发表长篇小说《生死晶黄》(《春风》第十一期)。另外有两个中篇,《平平淡淡》(《小说家》第一期)和《黄金洞》(《收获》第二期),以及一部短篇《眼》(《山花》第九期)。《黄金洞》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卷本《阎连科文集》。

一九九七年,四十岁。一月,发表中篇小说《年月日》(《收获》第一期),分别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上海优秀中篇小说大奖。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和《中华文学选刊》同时转载。《年月日》获得广泛好评。作品以寓言和象征的方式传达出一个倔强而又奇幻的“世界”,其粘稠感性的语言和奇崛、怪诞的想象赋予作品极为独特的气质。王德威认为,阎连科的《耙耧天歌》、《年月日》及第二年的《日光流年》延续了夏志清论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时所说的“露骨写实主义”,受苦,或是自虐,是叙事得以持续的原动力,叙事存在本身就是预知——也是预支——死亡纪事”。

这一年,阎连科还出版其他三篇小说:中篇

朱向前:《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相关文章有:于秋雨《和平环境下的军人灵魂——读阎连科的《和平雪》》,《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吴然《和平战》:健康人格与褊狭心理》,《小说评论》1994年第6期。

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序一》,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小说《金莲,你好》(《钟山》第二期)、短篇小说《活之传说》(《四川文学》第四期)和《小村与乌鸦》(《长江文艺》第二十一期)。《阎连科小说自选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八年,四十一岁。十月,发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花城》第六期)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日光流年》是阎连科在身体极度痛苦的情形下创作的,是一次生命之作。同时还有三个短篇:四月六日至八日,回你家去吧》(《北京文学》第一期)、《农民军人》(《上海文学》第四期)和《兵洞》(《小说家》第五期)。中篇小说《大校》(《解放军文艺》第二期),获得第八届“解放军文艺”中篇小说奖”。

《日光流年》被称作“世纪末的奇书力作”,发表后得到多位重要的批评家的充分肯定和各个角度的讨论。陈晓明认为:这部奇书把人的命运推到了最极端,非常有勇气。我看到了他对苦难的最直接的某种承担……这部小说是对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一种彻底颠覆。”戴锦华则看到了这部书在结构上的奇特,“《日光流年》在结构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形态,那就是时序的倒转”。这一结构特点被评论家王一川命名为“索源体”。其后,当代文学研究重要学术期刊《当代作家评论》以评论小辑的方式推出三篇关于《日光流年》的评论。

《日光流年》令人震惊之处不只在它写出了“乡土中国”的苦难与艰辛,而在于,它以纯粹象征体的方式,以独特的时间意识使“乡土中国”呈现出更为深远与广阔的本质,这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精神史,给我们展示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原始形态,那些不为时间、政治及文明进程所左右,深埋于地理、气候、时间之下的内核存在,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但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却形成一个超越于民族精神之上的大的寓意与象征,“创世神话”融入其中,有一种人类童年时代的完整、纯真、雄浑与无所畏惧的勇气。它写出了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型性与可能性,人在“不能承受之重”下的悲壮、勇气与决心,给我们展示了充满悖论的人类远景,这一远景是那样让人震颤地绝望、苦难,那样地丑恶、残暴,但却也蕴含着最大的希

望,信心与一种本原精神的胜利。

《日光流年》获得极大成功,也被一版再版,二〇〇一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二〇一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几乎每隔两年就再版一次。

一九九九年,四十二岁。创作中篇小说《朝着东南走》(《人民文学》第三期)和《耙耧天歌》(《收获》第六期)。短篇《去服一次兵役吧》(《西南军事文学》第四期)和《小镇蝴蝶铁翅膀》(《北方文学》第九期)。《朝着东南走》获得一九九九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中篇奖”;《耙耧天歌》获得第五届上海优秀中篇小说大奖。延续了《日光流年》和《年月日》中的“苦难”和“救赎”主题,想象瑰丽、怪诞。

出版第一部散文集《褐色桎梏》(百花文艺出版社)。世间最耐得住岁月折磨的,是乡下人的日子。”作者用诗意而沉痛的语言叙说了农民、乡村的生活和命运。

二〇〇〇年,四十三岁。发表短篇小说《一九四九年的门和房》(《长城》第一期)。

二〇〇一年,四十四岁。发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钟山》第一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获得“九头鸟”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发表短篇小说《景象》(《西南军事文学》第四期)、《梁弯儿》(《上海文学》第七期)和中篇小说《寂寞之舞》(《北京文学》第九期)。

《坚硬如水》展现了阎连科的语言能力和通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题记中写下这样的话:谨以此献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

《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阎连科新著《日光流年》研讨会纪要》,《东方艺术》1999年第2期,第19、20页。
王一川:《生命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陈思和的《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葛红兵的《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聂伟的《日常叙事:由“特性”到“个性”》。

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何向阳:《缘纸而上或沿图旅行》,《花城》1999年第3期。

阎连科:《农民症、贫和愚》,《阎连科文集——感谢祈祷》,第75页。

过语言结构生活的能力,这是《日光流年》后阎连科在长篇小说领域又一次对自己的彻底颠覆。小说以“文革”语言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男女在特殊年代对权力的疯狂攫取和对性欲的极端放纵,陈思和用“恶魔性因素”作为关键词分析这部作品。阎连科自己也说,“坚硬如水”的故事是那样地荒诞、疯狂,如果不是用那样疯狂的“红色语言”、革命话语去叙述,那这个故事的意義会减去一半”。通过语言的结构、方式和密度以呈现时代的精神逻辑,这种戏仿的、狂欢化的写作使我们感受到“文革”背后深远的历史秘密。

同年,小说集《耙耧天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另有两部中篇小说发行单行本:《穿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斗鸡》(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四十五岁。发表八个短篇小说:《地雷》(《牡丹》第一期)、《三棒槌》(《人民文学》第一期)、《司令员家的花工》(《山花》第三期)、《思想政治工作》(《钟山》第三期)、《去赶集的妮子》(《红岩》第五期)、《黑猪毛 白猪毛》(《广州文艺》第九期)、《爷爷奶奶的爱情》(《山花》第十一期)和《去往哪里》(《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其中,《黑猪毛 白猪毛》获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二年度“小说选刊”优秀短篇奖”。

出版第二部随笔散文集《返身回家》(解放军出版社)。小说集《三棒槌》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评论家李敬泽在“印象记”中写道,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夹在两片磨盘之间,他们被宏大的命运凶狠地挤压、研磨,他们必须在激情状态中达到生命的限度”。小说集《年月日:阎连科小说作品精选》和《乡村岁月:大地苍生的希望与失望》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夏日落》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阎连科卷》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十月,出版和文学博士梁鸿的对话集《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春风文艺出版社)。他在对话中把自己界定为“农民”,我说我是农民,是在呈现出一种我内在的真实。有一种农民,他们不种地,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心灵,都是由土地构成的,他们的表面似乎已经不是农民,但他们的本质还是农民”。

二〇〇三年,四十六岁。九月,阎连科在山

东大学威海分校分别作了《我为什么写作》和《只有追求 没有旁顾》两场讲演,同年秋,在洛阳大学作了《少年阅历与文学》的讲演,年底,在“万松浦书院”成立研讨会上作了《独立精神,是书院生命的灵魂》的讲演。

十月,长篇小说《受活》在《收获》杂志第六期发表。

二〇〇四年,四十七岁。《受活》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如同一匹怪兽跳入,惊动了文学圈”。它所引起的轰动效果绝不亚于《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

三月四日,“《受活》作品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王晓明、王纪人、王鸿生、蔡翔、杨剑龙、杨扬、许明、罗岗、洪治纲、吴俊、李洱等二十余位批评家和作家参加了会议。批评家从各个角度对《受活》进行分析,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杨扬认为《受活》中所谓的乡土性诗意的东西已经没有了,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的乡土性,实际上是一个悲惨的社会进步,没有幸福可言,这就与其他的高调的批判形成非常大的区别”。罗岗谈道,“《受活》的方言让我感到亲切,而其中的很多东西真实地接近于当下经验”。蔡翔对《受活》的方言进行分析,“《受活》的语言形式存在分裂,而这恰恰引起我的两点思考,一是避开了启蒙主义立场后怎样更好地再现同样分裂的、片断化的底层经验;二是怎样处理当下经验与社会主义记忆的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与下层经验之间的关系”。李洱认为,小说的细节绝对真实,但导向整体上的悖论,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六月飞雪。小说采用这种形式就是和方言写作一样,是对普通话为代表的文化体制、文化专制构成了一种反抗”。

批评家南帆把《受活》命名为“怪诞现实主义”,“《受活》将反讽推向一个极端。这就是反讽与怪诞的会合。相对于喜剧或者反讽,怪诞的辛

陈思和:《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03页。

李敬泽:《扛千斤之鼎》,《三棒槌》,第380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18页。

国内部分讲演收入:《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辣远为强烈”。并认为这里面包含着阎连科长期以来的思考，他的小说存留了大量现实主义的印记。然而，人们可以从阎连科的许多小说之中察觉某种额外的脉动。《年月日》如同一个临界点，缓缓的故事节奏背后，某种强烈的压力呼之欲出。一个特定的时刻，这种压力终于撑裂现实主义的躯壳——阎连科再也无法安详地工笔描绘一系列现实细节了。他不得不启动超现实的想象：《日光流年》寓含了一个神话结构，《坚硬如水》沉溺在夸饰的政治话语之中，《受活》的奇诡更加惊人——放手一搏的时候到了”。王鸿生则把《受活》的反向双重叙事称为“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所谓“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其意思当包含以东方的自然主义乌托邦来质疑、对照源自西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自由主义乌托邦……按照这一区分，所谓“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也可以被理解为，用一种新的或者更古老的乌托邦来替代既有的已沦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冲动。但上述两种理解也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忽略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这个说法的自反性、悖谬性。考虑到这一点，更为恰切的表达倒应该是：既通过乌托邦叙事来坚持乌托邦精神，又通过这一叙事来反对任何现实化的越界的乌托邦行动。乌托邦不能被现实化，但乌托邦叙事却又绝对是必须的。《受活》自己将证明这一点”。

王德威则认为：阎连科的《受活》尽管也充满狂欢冲动，却并不像莫言小说那样地肆无忌惮……阎连科、莫言对乡土的空间观照恰恰相反。莫言的胶东平原上红高粱四下蔓延，他的‘鬼怪神魔’外加英雄好汉宰藏其中，不时扰乱人间。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却有灵隐渠的恶水流过，一片荒芜，而生存本身逼出了种种怪现象。如果莫言的土地是植物性的（vegetarian），是物种孕育勃发的所在，阎连科的土地是矿物性的（mineral），不见生长，惟有死寂。”

李陀把《受活》称为“关于受活人的叙事”，并认为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茅枝婆和柳县长身上蕴含着当代政治逻辑，柳县长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其实他是一个漫画人物，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浓笔重彩，荒诞色彩特别浓厚。但是，我感觉漫画还不够……但到了后面就非常好，如柳

县长在列宁纪念堂下给自己也造了一个墓”。用这样的细节来象征出以为商品经济带来的自由化就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只是一种迷信，这就显得更有意味，也写出了以为自由化就能解决农民、农村的贫困的不可能性。《受活》揭示出农民走出绝境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它们之间是一种天然矛盾，这些矛盾一定会出现像柳县长这样的人……柳县长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是双重变态。一个是与“革命”联系起来的那种变态。把革命私立化取得一种合法性，把革命庸俗化。还有就是对商品经济的变态。

《受活》题记和后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激烈否定引起很大争议，但这一思考并不是阎连科的情绪表达，而是他对自己写作及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处位置的深刻疑问。

完成三个短篇：《奴儿》（《通俗文学选刊》第八期）、《革命浪漫主义》（《上海文学》第八期）和《柳乡长》（《上海文学》第八期）。

这一年，阎连科在各大大学作的讲演有：《小

南帆：《受活》：怪诞及其美学谱系》，《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的重要尝试》，《读书》2004年第2期。

《受活》题记为：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在名为《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的代后记中阎连科这样写道：真的，请你不要相信什么‘现实’、‘真实’、‘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等那样的高谈阔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生活摆在你的面前。每一样真实，每一次真实，被作家的头脑过滤之后，都已经成为虚假。当真实的血液，流过写作者的笔端，都已经成为水浆。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更不在火热的现实之中。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哪怕从内心生出一棵人世本不存在的小草，也是真实的灵芝。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是超越主义的现实。如果硬要扯上现实主义这杆大旗，那它，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

说与世界的关系》(上海大学)、《语言小说之用：从小说的开头说起》(北京大学)、《作家的角色》(山东大学)、《什么叫真实》(山东师范大学)、《小说的困境》(青岛大学)、《小说艺术的唯一性》(青岛师范大学)、《激情：小说文本内的文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学与底层人生活》(中国人民大学)。

二〇〇五年 四十八岁。一月 发表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花城》第一期)。出刊之后,《花城》杂志社被勒令收回该期杂志,并作深度检讨,《为人民服务》也被禁止再版和发行,原因是“诋毁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诋毁人民军队,诋毁革命和政治,滥性的描写”。但查禁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却让这部小说以其他方式迅速传播,更受关注。并在世界各国不断翻译出版,至今已有翻译版本二十余个,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为人民服务》“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并不陌生,且有一个完整的延续性的谱系。所不同的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左翼小说试图通过“恋爱”来彰显革命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但在《为人民服务》,包括《坚硬如水》中,“恋爱”却成为讽刺和解构革命“神圣性”的另类武器,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在“性爱”的污秽与疯狂之中,“革命”扮演了隐秘的压迫者、同谋和教唆犯的角色,一个融严肃与荒唐、理性与疯狂、神圣与庸俗于一体的世界呈现了出来,它们互相消解,但却相辅相成。

阎连科对自己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有深刻的认知:“《为人民服务》不是我的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一定是我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它的不凡之处,就是它来自作家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我一点都不为我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而为我今后的写作,能否凭借我是一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百姓而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和人格而忧虑。”他担心自己以后会受查禁的干扰而造成“写作中来自灵魂的想象力和爆发力的自我抹杀”。

二月,《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一致认为,“《受活》是一部具备探索性、试验性的小说,它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作品对深度的追求使它

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优秀作品,是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史””。入选“二〇〇四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三月,《受活》获第二届“二十一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这部小说“依赖狂飙般的艺术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摧枯拉朽地越过文学地形图上的种种禁忌,极富穿透力地凸现了耙耧山人复杂而奇特的现代境遇,并表达出对乡土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忧思和悲悯……这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不仅改写或丰富了五四以来乡土中国的书写传统,而且显示了这种书写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或美学趣味实施嫁接的可能”。

该年度阎连科还作了两场讲演:《让文学成为自己的生命之神》(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致词)和《军事文学的四道窄门》(解放军艺术学院)。作为一个曾经的军旅作家,阎连科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军事文学发展的因素:一是理论的束缚;二是形式探索的放弃;三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机制;四是作家文学观的沿袭守旧。

是年,离开部队,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二〇〇六年 四十七岁。一月 发表长篇小说《丁庄梦》(《十月》第一期),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丁庄梦》再次遭遇被禁的命运,并且因为稿费和善款等问题引起了一场文学界罕见的诉讼。这也使得阎连科成为“最受争议的作家”。

以艾滋病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是阎连科很多年以来的想法,为此,他多次走访艾滋病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时,也试图在现实层面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一些帮助,如联系医生,募捐,给村民打井,等等。在提及以什么方式写这部小说时,他说:“如果我能真实地记录这样一个世界性灾难在中国乡村的状况,我会放弃一切小说的技巧和文学修养。这至少是我的一个心愿……作家所能完成的是当他们得了艾滋病之后,他

阎连科:面对约束的写作——在英国“当代中国”文化节的演讲,《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第1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受活》的授奖辞,《作家》2005年第5期,第3页。

们的精神状况,生存境象,内心的痛苦,这绝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和电视画面所能表达的。”

对于中国当代生活而言,艾滋病并非简单意义的文明病症或现代病,而是与具体的制度方式、人性认知有关。有论者认为:“《丁庄梦》的疾病叙事企图指出,致命的、命定的因素不但不涉及不可知、不可违的天命与命运,而是肇始于‘难以违抗的政治命令’。小说借由捐血传播的染病途径,从公卫到经济,更介入国族政治论述,凸显艾滋病在中国成为‘集体绝症’巨大‘人祸灾变’的始末,批判意图相当强烈。”

该年度,《为人民服务》的日语、韩语、法语、英语版出版;随后几年中,《为人民服务》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希伯来、塞尔维亚、越南、荷兰、捷克、保加利亚、新加坡等二十几个国家出版。

这一年,阎连科作的讲演有:《“大江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几点启示》(“大江文学研讨会”)、《当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南京大学)、《个人的现实主义》(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发言)、《文学的“摆脱主义”》(郑州大学)、《文学与体制》(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化与我的创作》(辽宁师范大学)。

二〇〇七年,五十岁。《丁庄梦》获台湾“读书人奖”,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二〇〇六年十部好书之一”和二〇〇七年日本网站评为“最佳翻译作品”,法语版出版。以后几年,日语、韩语、英语、挪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和蒙古语的《丁庄梦》陆续出版。

出版十二卷本《阎连科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本年度发表的讲演有《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复旦大学)。

九月十五日,《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鲁迅博物馆、苏州大学文学院和渤海大学联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组织召开“阎连科作品学术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在该年度的第五期以专辑的方式推出了十篇关于阎连科的专论文章,包括刘再复《中国出了部奇小说——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王尧《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阎连科小说及相关问题平议》、孙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程光炜《阎连科与超现

实主义》、陈晓明《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等。

二〇〇八年,五十一岁。二月,发表长篇小说《风雅颂》(《西部·华语文学》第二期),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是阎连科首次以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而创作的小说,以清燕大学杨科教授的生活遭遇为起点,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成和特征。

小说刚一出来,就因被认为是“影射北京大学”而引起轩然大波,论者认为阎连科对高校知识分子生活并不熟悉,因此,造成写作中的一些失实。但从另一层面来看,《风雅颂》正是一部“褻瀆”之作。小说对中国文化经典《诗经》的“越轨”解读及对高校生活的审丑书写,都意味着阎连科仍然在突破“边界”,寻找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与途径。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批判知识分子生活,也在于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对自由精神的探索过程,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必须从羞耻与厌倦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位置。这也许是阎连科把《风雅颂》也作为“精神自传”的根本原因。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作《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的讲演。二月六日,应邀出访韩国,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作《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讲演;二月二十九日,在英国的“当代中国”文化节上发表讲演《面对约束的写作》;四月十九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表《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的讲演;五月二十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的讲演;五月十五日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五月三十日在法国第四届“小说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乌龟与兔子 压抑与超越》。

五月,出版《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土黄与草青——阎连科亲情散文》和《机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105页。

唐毓丽:《病患的意义——谈《天河撩乱》及《丁庄梦》的家族/国族纪事与身体》,《兴大人文学报》(台湾),2012年9月第49期,第145—182页。

邵燕君:《荒诞还是荒唐 读圣还是褻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巧与魂灵——阎连科读书笔记》(花城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五十二岁。四月,发表短篇小说《小安的新闻》(《作家》第四期)。五月,发表中篇小说《桃园春醒》(《收获》第三期)。

《年月日》法语版出版,次年译者Brigitte Guilbaud因《年月日》获得“法国国家翻译奖”,该作品被法国国家教育中心推荐为中学生的阅读书目。

《受活》以“列宁之吻”(Lenin's Kisses)为名在法国翻译出版,获得很大反响。之后各国译者均沿用“Lenin's Kisses”这一书名。

六月,阎连科出版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分别被中央电视台、搜狐网、中国散文协会、《新京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机构评为“二〇〇九年度优秀作品”,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这部作品比阎连科以往任何一部都要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是普通读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次“把心交给土地”的写作,没有任何语言、技巧、人物的构思和尝试,在再版《序》中,阎连科如实地道出了自己的创作体验,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我与父辈》那样不需构思、不事雕琢,笔握在手里,文字就从笔尖流淌出来。写作中,乱绪的情感在心里自纠缠到从顺,伤情伤心,常常会写着写着,拿起纸巾去眼睛上擦擦抹抹。文字间,没有震撼的跌宕,也没有大喜大悲的起落。可就是,内心里有一种隐隐不断的苦楚酸痛,像含着黄莲的自语。直到写完,直到出版,直到今天的再版,都还因为酸痛,不愿再去回忆那块土地上的家事遗物”。

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坚硬如水》,万卷出版公司再版《天宫图》、《四号禁区》、《朝着天堂走》等小说集。现代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的《情感狱》,并有法国翻译出版《我与父辈》之后,韩国、意大利等多种语言出版该作。

二〇一〇年,五十三岁。调入人民大学文学院,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宣称做一次“写作的叛徒”,不为出版而胡写”,最终完成长篇小说《四书》。这本书遭到了国内近二十家出版社的拒绝,最后只印制几百本“亲友赠阅版”。小说由四部分组成:《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西弗斯神话》,每

一部分的文体和语言之间又具有差异性和互文性。作者对该作寄予厚望,一方面言说着触目惊心的故事,另一方面是以象征的笔法将“学者、作家、音乐家、宗教”等置于“孩子”的威严之下,纯真和邪恶、幼稚与威权在小说中具有对抗的统一性。评论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四书》语言的创新,孙郁认为“这是带有神性的笔触,可是却是人间的另一种写真”,作者不断挣脱旧的语言习惯给自己带来的压迫。他在反抗旧的叙事时空的时候,也在抵抗业已形成的语言逻辑。比如大量运用短句,限制修辞的滥用。比如以简练的半截话留有空白,不让纸面堆满闲语。他使用的词语是血色与灰暗相间的。痛感的词汇与辽远的神秘感并驾齐驱,并且融进圣经体的语词,叙述口吻在天宇与地狱里回旋,思想的时空辽阔而耀眼”。王彬彬认为,阎连科用“粗重”来形容落日的质感,用“一杆一杆、林挤林密”描述落日的光线,都堪称新鲜。超短句、三字句、单音词,都是为了让读者产生参差、生涩、凌杂、峭拔和急促的感觉。而之所以要追求这样一种美学效果,显然与孩子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有关”。

与《年月日》中的先爷将自己的躯体化作玉米秧的肥料所不同的是,在《四书》中有一个重要情节是“作家”用自己的血水浇灌着麦苗。王彬彬认为,在这方面,阎连科之所以做得很成功,就在于其叙述语言的精细、考究,就在于他把这一荒诞的过程叙述得细腻、绵密,从而使每一个具体情境都纤毫毕现,产生一种直逼人心的“真实”。以血喂养小麦便能让小麦长得异常茁壮,便能让麦粒像玉米粒那么大,这是否有科学上的依据,已毫不重要。这一行为本身已具有象征性。它极其有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心智上的迷狂、错乱和愚蠢”。程光炜也认为,“通过时间与血水的竞赛,种麦与劳动的竞赛,主人公与历史的竞争,那种浪漫化的‘劳动’神

阎连科:《我与父辈·再版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孙郁:《写作的叛徒》,第134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王彬彬:《阎连科的《四书》》,《小说评论》2011年第2期。

话破灭了,露出了最残酷的真相,露出了它反人类、反人性的真实面目。劳动走向了马克思严厉谴责的背面,它甚至还不如《资本论》所指出的那种交换价值的文明等级,而变成对人尊严和精神生活最无情最彻底的剥削”。杨庆祥认为在《四书》中,阎连科找到了一种非常简洁同时很有力量的形式把‘历史’重置”。

发表中篇小说《亲爱的,西班牙》和散文《案案之痛》(《青年文学》第十一期)。

四月二十日,应邀到台湾成功大学发表讲演《文学的愧疚》,对自己和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作了深度剖析,从历史、土地、现实和文学自身四个角度探讨了当代文学的愧疚之处,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位重要作家的责任意识 and 担当意识。六月四日,参加挪威文学周活动,于奥斯陆文学中心作了《让灵魂的光芒穿越布满雾霾的头脑与天空》的讲演。六月九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图书节发表《堂吉诃德、阿Q和我》的讲演,认为堂吉诃德可笑、荒谬却分外可敬、可爱,阿Q却是可笑、荒谬而可悲的。堂吉诃德是理想主义浪漫喜剧中包含着悲剧,而阿Q是现实主义悲剧中透着可笑的喜剧”,堂吉诃德的正义、博爱和奋斗的理想,是今天西班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库房,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化、文学和中国现实中较为缺乏的”。十一月一日在新加坡文学节发表《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学共通性》讲演。

本年度,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年月日——中国当代作家获奖作品典藏》(阎连科卷)。

《受活》被《南方周末》评为“三十年十大好书”。日、韩、英、德、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有译作出版。

二〇一一年,五十四岁。三月,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发现小说》(《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同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该文中,阎连科将“现实主义”分成了四个层面:控构现实主义、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和灵魂现实主义;总结分析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因果律: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和内因果。进而,阎连科提出自己的创作理论主张,即“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

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实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发现小说》是一部严谨的、系统的理论著作,是阎连科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传统”和文学创作规律思考的结晶。

出版《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收录和张学昕、陈众议、蔡莹等人的对话;出版了由林建法策划的四卷本《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集《走着瞧》(东方出版中心)。

十月,《我与父辈》获首届“施耐庵文学奖”。

十二月,《四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和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亚洲周刊》把它称为是一部“保外就医”的奇书”,当被问及“如何设定人物”时,阎连科说:我认为最独特的‘人物’是其中的‘孩子’,他亦真亦幻、亦正亦邪,充满了天真的恶和醒悟后的善,他和‘宗教’所构成的关系,使读者可以感到我们中国正因为没有宗教,才充满着缺少宗教的不安和焦虑。对于《四书》,与其说它写了宗教,不如说它写了因为没有宗教而给这个国家、民族和人类所带来的灾难和不安。”

《风雅颂》越语版出版。而其他英、美、澳大

程光炜:《“焚书”之后》,《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杨庆祥语,见杨庆祥等《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想象和书写——80后学者“三人谈”》,《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阎连科:《堂吉诃德、阿Q和我——在西班牙马德里图书节的演讲》,《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第7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阎连科:《发现小说》,第180-18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邢舟:《阎连科禁书香港出版》,《亚洲周刊》2011年第11期。

利亚等都有译作出版。

受国外多个文学节邀请出访。发表的重要讲演有:三月三日、四日、五日在“澳大利亚佩斯作家节”的三场讲演——《为了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推开另外一扇窗》和《选择为折断翅膀的麻雀疗伤》;三月十日在悉尼大学孔子学院讲演《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四月二十七日在“美国纽约作家节”讲演《避不开的文学与政治》;六月二十三日在韩国女子大学讲演《心与土地》;九月一日在“挪威比昂松作家节”讲演《做好人,写坏的小说》;九月三十日在韩国庆星大学中韩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韩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浅析》;十一月十九日在美国迈阿密书展上发表讲演《推开书房的另外一扇窗》;十二月九日在意大利米兰文化中心讲演《从卡尔维诺在中国的冷遇说起》;十二月十一日在罗马第三国际大学讲演《选择、被选择和新选择》。

由《丁庄梦》改编的电影《最爱》经过重重审查后终于上映,导演顾长卫。

二〇一二年,五十五岁。一月,《丁庄梦》入围二〇一一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决选奖。英文版入围英国《独立报》“年度翻译决选奖”,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好书”。之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版,在日本出版盲文版,这是日本自老舍之后第二次出版中国作家盲文版作品。

《四书》的法语和韩语版出版,并且入选法国世界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最终决选。正在翻译的有英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捷克语、日本语等。《夏日落》韩语版出版。

三月至六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作驻校作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炸裂志》。

三月,出版长篇散文《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七一一号院》(江苏人民出版社)。“七一一号院”的短暂生活被阎连科认为是“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人生”,但这段“诗栖人生”却很快被“城市化”发展的步伐粗暴地打断。七一一号院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对个人自由的争取,阎连科加入了“抗拆迁”的行列,“作家抗拆”由此成为该年度文化界一个重要事件,但最终,“七一一号院”还是变成了一堆瓦砾。在文章的结尾,阎连科这样写道,那一

夜,我做了一个美妙的梦”,到了一个除了蓝天、白云、河流、芳香、鸟雀和茂盛的植物、繁多的昆虫再无他人的世界里,重新建起了一个新的园子与庭院,开始了新的写作和阅读、种植与养育,喂了无数、无数的猫、狗,蜻蜓、蝴蝶每天都从花草树木上带着爱和芳香飞下来,落在猫的背上、狗的耳朵上和我的笔尖上”。这或者是阎连科所能做的最大反抗。

四月二十一日,阎连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丧家犬的一年》一文,对过去的二〇一一年进行了悲愤而无奈的记述: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该文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阎连科也密切关注本年度愈演愈烈的中日钓鱼岛事件,当他看到村上春树等日本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公开表达观点,在争端面前将理性引入讨论时,他为自己作为中国作家这么迟缓地作出反应感到羞愧”。为了呼应异国的那些同行,阎连科撰文《缓和亚洲的对立语言》一文,发表在十月五日的英文媒体《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日本《朝日新闻》上,他呼吁,在任何国家,如果听不到理性的声音,灾难会随时发生,而普通人将会受苦”。我痛苦地了解到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复杂世界的微弱地位,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任何用处的话,现在是我们发声的时候。”

五月,出版海外讲演集《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中信出版社)。其中更为新近的讲演是在韩国“亚、非、南美洲文学讨论会”的《守住村庄》。阎连科认为,作家“必须重新寻找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从自己的土地、村庄、码头、航站出发去旅行,去与今天的世界联系和对接,使这个村庄、这片土地、这个码头和航站有着世界性”。但是,在有了自己的村庄和土地之后,作家却“还没有找到从那村庄通向世界的路口和车站”。为此,我将固守在这个村庄里,固守在这块土地上,不停地为此写作、寻找和建造,哪怕老去与死亡,都顽固地守住这

块土地和村庄。”

本年度,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日光流年》、《受活》、《情感狱》等长篇,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风雅颂》,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名家自选经典书系·朝着东南走》。

二〇一三年,五十六岁。二月,《受活》英文版(沿用了“Lenin's Kisses”这一书名)在美国出版,之后,英国和澳大利亚也相继出版,受到一致好评。《纽约客》、《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都有专文推荐和评论。并且,因为《受活》在英语国家的出版,推动了“国际布克奖”对阎连科的最终提名(该奖给作家,而不是给具体的书)。华裔作家哈金认为,“《列宁之吻》是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有着宽阔的精神和富于创造力的结构。它是一首真实与想象杂糅,以夸张的方式讲述荒谬和现实,并能激发欢笑和泪水的狂想曲”;Kirkus Reviews(柯克斯评论)这样评论,这是一部融合了君特·格拉斯、托马斯·品钦和马尔克斯味道的讽刺杰作”;《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认为,“《列宁之吻》以充满嘲弄的讽刺性手法描述了一个趋炎附势的社会,在那里,金钱和权力被无原则地崇拜”。

《受活》挪威语版出版。正在翻译的有韩语、日语、德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瑞典语、丹麦语、保加利亚语等十个语种版本。

《坚硬如水》韩语版出版;《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七一一号院》韩语版正在翻译,韩国子音母音出版公司筹划出版阎连科全集。

三月至四月,应邀到美国杜克大学、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和加拿大一些大学作巡回讲演。三月二十日,在伯克利大学作《没有尊严的生活与庄严的写作》的讲演;三月二十三日,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演,题目为《国家失忆与文学记忆》;三月二十六日,在德州大学图书馆作《美国文学对我的几点影响》的讲演;三月二十九日,在杜克大学作《我对禁书的十点看法》的讲演;四月一日,在北卡大学讲演,题目为《我的一份文学检讨书》;四月二日,在耶鲁大学作讲座,题为“‘事绪’与‘心绪’的中西叙述”;四月三日,在

哈佛大学作讲座,题为《恐惧与背叛将与我终生同行》;四月八日,在纽约大学发表讲演,题为《集权与有限宽松双重天空下的写作之求向》;四月九日,在斯沃斯莫尔学院,作题为《在中国文学体制下的作家独立性》讲演;四月十日,在罗格斯大学作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轻与重》。

七月,修改并完成长篇小说《炸裂志》,将刊登于《收获》秋冬卷。

八月,由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七届花踪文学奖,三日在吉隆坡揭晓。阎连科获得最高奖——第七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这个奖项是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成就及对文坛贡献的肯定。阎连科是继王安忆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作家。

九月,《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推出“阎连科专号”,这是这本杂志继二〇〇七年第五期后第二次推出阎连科的研究专号,其中包括陶东风的《〈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孙郁的《阎连科的“神实主义”》以及林源的《〈当代作家评论〉视阈中的阎连科》等。

九月,《风雅颂》韩语版出版。《四书》捷克语版出版。

《日光流年》的法语、韩语版将分别出版。此时,距离《日光流年》的初次出版已经十五年。

(本文为梁鸿“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成果;为蒋书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中西文化视域下的新时期文学研究”(DUT10RW4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蒋书丽,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阎连科:《守住村庄——在韩国、亚、非、南美洲文学讨论会》,《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第168-16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